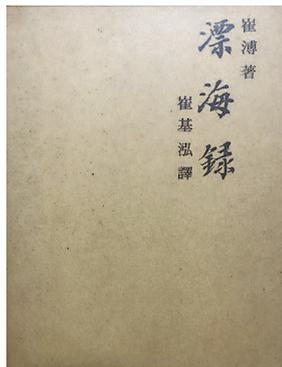


## 学林

← (上接3版)

鸡、豚、驴、牛之畜，松、篁、簾、棕、龙眼、荔枝、桔、柚之物，甲于天下，古人以江南为佳丽地者以此。”而在江南诸地中，苏杭两地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繁荣、交通便利、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等因素，使得崔溥对杭州与苏州的描述最为丰富、且评价最高，其谓杭州“即东南一都会，接屋成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绵绣；蛮榑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



《漂海录》韩文全译本(崔溥后人崔基泓译)

谢之花，八节有常春之景，真所谓别作天地也。”而苏州则“海陆珍宝，若纱罗绫缎，金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皆萃于此。自古天下以江南为佳丽地，而江南之中以苏杭为第一州，此城尤最。”

对江南人性格的描述中，崔溥认为江南人性情和顺，而江北则人心强悍。崔溥一行曾在漂流至宁波“下山岛”时遭遇海贼，贼人将崔船上所剩无几的衣物米粮搜刮而去；后行至“仙岩里”(今台州市三门县浦坝港镇仙岩村)时，又被里人劫走了马鞍。随着此后其朝鲜人身份被当地管辖卫所查实，千户官随即连夜鞫问了仙岩里里长，将劫夺崔溥马鞍之人抓捕、报送官府，并将马鞍物归原主。有感于此的崔溥不禁发出了感慨：“今江南人虽或被利心所使，为盗为劫者有之，然下山之盗不杀臣等，且有遗物；仙岩之人不隐所劫，竟还夺鞍，可以观风气柔弱，人心不甚暴恶之验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当崔

溥经过山东恩县时，见到河中有劫盗所杀漂尸，崔溥为此认为，江南人虽为盗，皆劫而不杀，而北方人则多有劫盗杀人，“山东以北，一家人不相保，斗殴之声炮闹不绝”，尤其“山海关以东，其人性行尤暴悍。”

至于对江南人文化程度的描述，崔溥一行来到台州市健跳所时，一位丙午年(1486)登科的进士张辅闻讯而来，指着科举题名录中自己的名字示以崔溥，介绍道，“我国制，草茅士登第者，皆官给俸禄，旌表门闾，刺街，亦书赐进士及第某科某等人”，并将崔溥引至其家，其家前以雕龙石柱作二层三间之门，金碧眩耀，门上书写着“丙午科张辅之家”。然而正露得意之色的张辅在登第与官位皆更高一筹的崔溥面前，很快就败下阵来。在见到崔溥随身携带的文科重试名录后，张辅立马甘拜下风，承认道：“我殆不及也。”此处，中朝文人互比登第与官阶的意趣跃然纸上，与此同时

也写出了江南人尚学、崇学的风气。崔溥最后总结道：“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闾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

服饰为明代物质文化的载体，是社会经济、文化、风气等诸多因素融合而成的产物。随着明中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人的物质生活开始愈发丰富，并显现出一定的奢靡之风。衣物的质地由质朴的棉麻开始转向华丽的绫罗绸缎，头饰造型愈加精致丰富。为此，崔溥在对江南人衣冠配饰的描写中如实记载道：“江南人皆穿宽大黑襦裤，做以绫、罗、绢、绉、匹缎者多；……首饰于宁波府以南，圆而长而大，其端中约华饰；以北圆而锐如牛角然，或戴观音冠饰，以金玉照耀人目，虽白发老姬皆垂耳环。”此外，据崔溥观察，“江南好冶容，男女皆带镜奁、梳篦、刷牙等物。”江北则“不见带之

者”，故而体现出江南人相较更为注重仪容和仪表。

此外，崔溥还有一些其他较为细节性的考察，比如提到有关交通工具，“江南陆路行用轿，江北或马或驴。江南无良马，江北马大如龙”。有关丧仪葬俗，“江南人死，巨家大族或立庙、旌门者有之，常人略用棺，不埋委之水旁，如绍兴府城边白骨成堆。江北如扬州等地，其坟莹或于江边或田畔、里闾之中。江南丧者、僧人或食肉，不食荤，江北则皆血食茹荤。”另有关于货币，“江南市中使金、银，江北用铜钱”，等等。

李朝时期，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留下了不计其数的纪行文献，而崔溥是整个明代唯一一位漂流至中国、行经大江南北、撰有详尽日记的朝鲜士人。《锦南漂海录》记述了朝鲜贡使从未记录也无法记录的江南社会，为今人回溯明代江南世界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生动画卷。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 宋人多为纸背书

王瑞来

近年来，有别于古籍正文内容、书写于纸张背面的文字渐受重视，被称为纸背文书。已故京都大学教授笠沙雅章先生在多年前就曾撰写《汉籍纸背文书研究》(载《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十四卷，1973年)一文，对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汉籍纸背文书做过初步统计，可谓开草莽的研究。后来，对于古籍纸背印本与钞本的统计，学界又有更为精密的研究。据瞿冕良先生在《略论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一文(《山东图书馆季刊》1992年第2期)统计，历代公文纸印本、抄本达96种。近年校勘周必大文集，于《省斋文稿》读到几则题跋，都涉及了纸背文书。

其一为卷十五的《家藏小草洛神赋》：

钱穆父谓王子敬草书《洛神赋》在范尧夫、王晋卿、范中济三家，元祐末合而摹藏之，遂以入石。今欧阳文忠公所临四百八十五字，题云欧阳询书。或乃以穆父所聚，即率更笔，未知孰是。予不识字，特以人之贤而宝藏之耳。按欧阳氏家谱，文忠盖率更二十代孙，是固一家也。纸背乃晏元献行状，当时求铭于公者。

其二为同卷的《题六一先生家书纸背猪肉帖》：

右熙宁三年春欧阳文忠公家书一通，盖其仲子下第时也。前二年，公方自毫帅青，故戒以勿令入城。所谓黎君，即州学教授，公集中尝赠答三诗

者。曹不知何人，其旧吏或邦人之贤者？与？纸背乃寿光邑官光颖谢书，偶无其姓。寿光，青属邑。公职带观文，官为兵书，属吏舍职呼官，又不称在朝前衔。当时大率不以为简也。所送才猪肉斤余，非上丁分胙，则例册如此。前虽剪去，度不过尊酒之类，岂敢如近岁公违甲令，上下以货泉为礼耶？以状易牒，盖自元丰四年十一月改行公式，士大夫亦改之云。

其三为卷十九的《书韩忠献王帖》：

一帖与参政尚书，即赵公叔平也。末题正月七日，而纸背乃邠兵张佑诉牒，犹称治平五年者，是岁正旦改熙宁元年，诏书未到头耳。

这三则题跋所记述的纸背文书，一则是写在欧阳修所临《洛神赋》的背面，为晏殊的行状，周必大分析是别人求欧阳修撰写晏殊的墓志铭或神道碑铭时提供的。欧阳修利用背面临写了《洛神赋》。一则是写在欧阳修家书的背面，是一个名叫光颖的寿光人感谢别人送猪肉的书简。除了与欧阳修有关的两则，还有一则是韩琦的书札，写在邠兵张佑诉牒的背面。

不光是欧阳修和韩琦，苏轼也使用纸背书写。南宋初年的李纲，就写过一则跋文，收录在《梁溪集》卷一六三，题为《跋赵正之所藏东坡春宴教坊词》，跋文如下：

东坡乐语信笔而成，初不停缀，改不过数处。属对精切，皆经史全语，不假雕琢，自然成章。吁，可畏

而仰哉！卷尾草书渊明诗，纸背乃经筵当读宝训艺祖遣潘美、曹彬下江南方略。此轴所谓三绝，真可宝也。

北宋的另一个名人，担任过宰相的苏颂，也有纸背书写的记录。吕祖谦《东莱集》卷一五《入越录》载：

仁仲，苏子容丞相孙，致仕闲居，年垂八十，道前辈事叠叠不厌。出旧书数种，《管子》后子容手书庆历乙酉家君面付，犹苏河阳所藏也。纸尾铭款云：惟苏氏世官，学以儒，何以遗后？其在此书，非学何立，非书何习？终以不倦，圣贤可及。其曰书秩铭戒者，子容所识。其曰：先公铭戒者，铭语亦同。盖子容之子所识也。纸背多废笺简刺，字异今制者。末云牒件状如前，谨牒，如前辈所记。署衙多杭州官称。子容云知府舍人，乃知杭州时也。

关于宋人的纸背书写，文献中也有记录。元人吴师道《礼部集》卷一七《潜虚旧本后题》云：

某少好占筮等书，尝购得司马公《潜虚》附以张敦实发微诸论者，不知何人所刻，其书完具无缺，意为善本也。又得里中孙氏写本，盖提刑公究文故物。纸背有梁克家为福建安抚使、韩彦直知泉州时手书名，当时往来书札也。

在《礼部集》卷十八《灵棋经后题》亦载：

予家先大父畜此书，甚敬信之。纸背有绍兴十一年棋兵官记所占验事，三象内第七卦为人剪去。岁

久纸烂，祭法以后残缺，俾儿輩重写。因题。

北宋后期的黄伯思在《东观余论》卷上“王敬武书辨”条亦载：

太医丞乐君珍畜唐人一帖，题云委曲付师范，跋之者以后有彭城私记，为刘梦得书。以中云大驾归，定为德宗自兴元还时，皆非也。余按此乃唐平卢节度使王敬武与其子师范书也。纸背有王珙署衙甚详，上云谨谨上相公，下云从侄保义军节度使魏观察等使珙封状。此珙与敬武书，敬武就其纸作家问寄师范耳。

这是宋人记载唐人利用别人来信的纸背又写家信的例子。

明人张萱《疑耀》卷三“宋纸背面皆可书”条载：

余幸获校秘阁书籍，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类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牒笺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坚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若今之纸，不能尔也。

张萱的记载，指出了宋人印书多用公文旧纸的事实。张萱所述事实可以得到现存的实物印证。前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曾把上海博物馆所藏宋刻龙舒本王安石文集《王文公文集》的纸背公文题名《宋人佚简》专门印行出版，以供宋史研究之用。

为什么宋人多在纸的背面写字或印书？纸背书写或印书，自然是出于惜纸，这就需要被再利用的纸质要好，要有一定的厚度，不然过去皆

用毛笔写字，纸质过薄就容易洇透到另一面。上面张萱就讲到，宋纸“极坚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同时张萱还慨叹“若今之纸，不能尔也”。据讲，根据对敦煌文书纸张的技术分析，宋以后的造纸多使用中国传入西域、又由西域传回的更为低成本的技术。由于大量廉价纸张的出现，更是带来了印刷业的繁盛，当然，廉价的纸质自然也让人慨叹今不如昔了。其实，明代的纸质还不算太差，现存的公文纸刊本、写本除宋代以外，元明时期也有不少，反而清代则很少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纸质大概不大适宜于纸背再利用。当然也并非绝对。笔者便曾见过背面写有满文的宋人笔记《朝野类要》的抄本。清代纸背较少利用，同时还反映了纸张的大量生产，人们惜纸意识的降低。这一事实也反证了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和黑水城文献为何会存在有大量纸背文书，正是因为那时纸张还比较珍贵，所以会得到充分使用。

包括周必大所记载的纸背文书在内，都为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细部史料，值得宝贵和深入研究。任何事物的发展，皆有渊源与流变，然迄今为止的纸背文书研究，多留意于印本和抄本等书籍形态，对于文献中关于纸背文书的史料则缺少一定的注目，因聊为发掘，以为纸背研究之一。(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